

「仇內意識」損港根本利益

□顧敏康

有人說，現在「一國已經代替兩制」，這可能是對「一國兩制」這個核心價值缺乏足夠的認識。兩制是不能絕對化的，關乎一國的大事。「身份認同」的民調在某些人看來是如此的正常，說明他們對「一國兩制」認識不透。對這些人的觀點，如果中聯辦的官員不加以針鋒相對的批評，那是失職。

指點香江

在香港的意大利品牌D&G店舖因不准港人拍照而引起公憤，繼首次有過千人圍攻D&G店舖抗議後，最近又有近百市民兩次響應網上號召到D&G店舖抗議。據媒體報導，此事的起因是D&G的保安人員區別對待港人和內地人，禁止港人拍照，卻容許內地人任影。如果報導屬實，這也僅僅屬於D&G公司的行為失當，與內地人有何干係？然而，這幾天有文章表明，D&G事件僅僅是導火線，更深層的原因恐怕是兩個：一個是反內地人的情緒，認為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不僅影響了商品供應量，而且也推升了商品價格；尤其是內地孕婦大量增加，衝急診室的數量急劇增加，導致對港人孕婦的服務質量下降。另一個恐怕還是對「一國兩制」的核心價值缺乏足夠的認識。過分強調香港的獨立性而忽略對一國的認同。將中聯辦官員批評「身份認同」的民調視為不當干預。有的人簡單地將中聯辦官員的批評歸結為「一國已取代兩制」。

內地對香港貢獻大

「一國兩制」不反對兩地經濟上的密切往來，理想的做法當然是實現如歐盟所提倡的貨物流動、人員流動、資金流動和設立商業組織的便利等。內地自由行動，為香港帶來無限商機，為經濟振興注入活力，零售業、旅館業、餐飲業等均獲得了可觀的商業利潤。這些企業的盈利也增加了政府庫房收入，利於社會福利的提升。毫無疑問，內地人的購買力十分巨大，可能會帶出一些負面效應，例如貨物緊缺和價格提升。但是，這種情況的出現，只能說明政府和商家估計不足或應對不當，將怨氣瀰向內地人，的確不夠公平。香港的企業要有社會責任，不能唯利是圖。據媒體報導，有個別零售店刻意把奶粉，加價賣給內地人，一罐貴幾十至上百元。內地人吃高價奶粉，香港人買不到奶粉，兩者都是受害者！

你言我語

「買古蹟」非治本之策

□徐振邦

保育古蹟、活化建築，在在需財。這點，市民是理解的。保育及活化的項目，所費不貲，但只要公帑用得其所，相信不會有太大的反對聲音。近年，政府經常為古蹟「出手救亡」。早在2004年甘棠第的問題上已開了先例。當年，甘棠第的業主拆卸建築物重建，結果，政府於2004年2月與業主達成共識，並動用五千三百萬元購入甘棠第，然後再斥資九千五百萬元完成復修工程。經過翻新工程後，甘棠第於2006年變成孫中山紀念館。另一個要政府以換地形式進行保育的，是景賢里。由於景賢里的業主在2004年進行招標工作，當時有不少團體及市民開展了「拯救景賢裡運動」，希望能「買下」景賢里。最後，政府與業主達成非原址換地協議，用旁邊一幅市值逾五億元的政府地皮，以「地換地」方式補償業主。在物業落成後，估計每平方呎售價可達三萬五千至四萬元；以此計算，市值可達十億元。至於即將公布是否列入法定古蹟的何東花園，可能又成為另一個要政府買回來的歷史建築了。原稱曉覺園的何東花園，建於1927年，是何東爵士的大宅。何東爵士是香港早期的領袖，而這幢大宅又是本港開埠初期，唯一獲准在山頂興建的有華裔血統的商人物業，因此，何東與何東花園，與香港發展的關係密切。將何東花園列入暫定古蹟，是有充分的理據。不過，要將何東花園升格為法定古蹟，並動用公帑購入何東花園，則要詳加考慮。畢竟，政府應推出有規劃的保育方案，而不是採用「見一幢買一幢」的策略。若然以「天價」買了一個何東花園，將來還有多少類似的建築需要購買？

正視內地孕婦湧港

□陳振寧

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議題已造成五大群體「共輸」的局面：一是內地孕婦所生的子女。有意見認為，該批人士應與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作差別對待。必須指出，現行法律下，該批人士已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屬於香港的大家庭，政府有責任向其提供公共服務，包括教育、醫療、房屋等。若然將其作差別對待，無疑是為社會製造另類群體，構成分裂，不利香港的長遠發展。二是內地孕婦和其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丈夫。這類內地孕婦與另一類與丈夫均為內地居民的孕婦是有分別的，她們應得到區分對待。該批夫婦大多屬社會中下層，使用私家醫院的服務會異常吃力。政府不區分對待的政策後果就是誘使孕婦在最後一刻衝進急症室，危及孕婦及胎兒的安全。三是合法來港產子的內地孕婦和其內地居民的丈夫。這類人士是依據現行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規定，辦理手續和繳付費用來港。只要政府設置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配額，視此為發展醫療產業的一部分，這類人士來港不應被歧視。四是皆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夫婦。夫婦眼見公私營醫院的服務供應緊張，床位難求，都對生育感到猶豫，進而打擊香港的生育率。家庭環境稍好的夫婦，也需與內地孕婦競爭，以取得私家醫院的床位。五是公立醫院的醫護。他們要隨時面對內地孕婦衝入急症室的景況。這些孕婦中，部分可能連產前檢查也沒有，醫護需要面對更大的壓力。久而久之，更多醫護將轉至私家醫院工作。這五類群體之間以至與香港社會都構成一層一層的矛盾。隨着內地孕婦的子女長大，影響的深度加劇，香港將有更多群體被捲入事件中。政府需檢視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帶來的問題，香港是否有能力克服，若然可行，應盡快制訂長遠的規劃，將問題置於控制範圍內；若然不可行，則應盡快討論堵截的方法。

當然，將D&G風波無限放大和上綱上線，這是不應該的。有人認為「禁拍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更深層次的矛盾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被衝擊踐踏」。大肆鼓吹「香港人什麼都不是，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將港人與中國人割裂。這就難以讓人接受了。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管某人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香港人不能只是純粹的香港人，他們不能迴避自己是中國人這個客觀和法律事實。鼓吹「香港人就是香港人」者如果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他大可以放棄特區護照，因為那上面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樣。有人說，現在「一國已經代替兩制」，這可能是對「一國兩制」這個核心價值缺乏足夠的認識。兩制是不能絕對化的，關乎一國的大事，中聯辦官員當然可以發聲評論，那是履行其維護一國的職責。「身份認同」的民調在某些人看來是如此的正常，說明他們對「一國兩制」認識不透。對這些人的觀點，如果中聯辦的官員不加以針鋒相對的批評，那才是失職。有人認為，十五年前中央幹部比較低調，過去的新華社沒有今天的中聯辦高姿態，這是「一國已經取代兩制」的標誌。筆者覺得難以接受：誰規定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官員不可以就涉及一國的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呢？

「仇內意識」具危害性

內地人來港時，難免會有人將壞習慣帶來香港，例如大聲喧嘩、排外意識較差等。其實，這些缺點也不是內地人獨有的。只不過人們將焦點集中在內地人身上，就變成了不滿的最好藉口。其實，從包容的角度看，內地人來香港，既是為香港帶來經濟好處，也是一種文明禮貌的進修機會。香港扮演這種積極作用，何樂而不為？「仇內意識」的存在不利於兩地的經濟發展。這種意識存在，會出現如有人所說的「內地人騎着中槍」的現象。其實，「仇內意識」的存在，也不僅是現在的事情。過去有些港人自以為高人一等，視內地人為貧窮、落後的「北方人」；即使內地人移民香港，也被嘲笑為「阿燻」。現在內地經濟發展迅速，內地人開始富裕，可以來香港消費，明明主流是來貢獻香港社會，拉動

消費，卻被視為「搶」客，不夠優雅。照這些人看來，「名牌時裝店內氣氛優雅，顧客都是精挑細選心儀衣服，慢慢試身，合心意才選購」。而內地人缺乏這種高雅，買東西喜歡搶，買奢侈品也搶。這裡的「搶」顯然不是「搶劫」，是付了真金白銀的快速、大量購買，其實是利了商家；「搶」也可以解讀為豪買，將其視為醜陋的中國人的形象，實在不妥。內地人排外意識較差，值得改進。好在香港的商店均屬開架服務，內地人購物時間有限，速戰速決也不必過於指責。然而，筆者贊同這樣的提醒：香港人「仇內意識」愈演愈烈，對兩地關係勢必構成一股衝擊，兩地政府應當重視這一現象，防止這種意識的蔓延。

正確認識「一國兩制」

當然，將D&G風波無限放大和上綱上線，這是不應該的。有人認為「禁拍事件只是導火線而已，更深層次的矛盾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被衝擊踐踏」。大肆鼓吹「香港人什麼都不是，香港人就是香港人」，將港人與中國人割裂。這就難以讓人接受了。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不管某人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香港人不能只是純粹的香港人，他們不能迴避自己是中國人這個客觀和法律事實。鼓吹「香港人就是香港人」者如果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那他大可以放棄特區護照，因為那上面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字樣。有人說，現在「一國已經代替兩制」，這可能是對「一國兩制」這個核心價值缺乏足夠的認識。兩制是不能絕對化的，關乎一國的大事，中聯辦官員當然可以發聲評論，那是履行其維護一國的職責。「身份認同」的民調在某些人看來是如此的正常，說明他們對「一國兩制」認識不透。對這些人的觀點，如果中聯辦的官員不加以針鋒相對的批評，那才是失職。有人認為，十五年前中央幹部比較低調，過去的新華社沒有今天的中聯辦高姿態，這是「一國已經取代兩制」的標誌。筆者覺得難以接受：誰規定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官員不可以就涉及一國的問題發表意見和看法呢？

作者為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諮詢文件

保龍

重慶創新發展三亮點

□紀頌鳴

神州點面

過去一年，美國金融危機、歐洲債務危機不斷影響中國，後者經濟開始下滑，而西部重鎮取得顯著成績的重慶，卻完全不受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不少經濟增長的指標領跑全國，在抗禦金融危機、創新發展中展露亮點。重慶能有今天的成就一點都不奇怪，二〇〇八年底，筆者在採訪時就感受到不一樣的重慶。那時全球正遭遇金融危機，中國沿海的外向型經濟受挫，重慶則在危難中審時度勢，不斷走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路。二〇〇九年二月份，某周刊的一篇題為《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線》的報道，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那時，重慶經濟已經脫穎而出，全國GDP保八，重慶保的是十二。今時今日，重慶更不斷刷新各項指標的紀錄，需要探討的是，重慶經濟亮點背後的支持點究竟是什麼？

十多項指標全國第一

去年，在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物價上漲的情況下，重慶地區生產總值接近1萬億元，增長16.5%，工業增加值、實際利用外資、進出口總值、航空口岸貨運量分別增長22.5%、58%、125%、11倍等，重慶有十多項經濟指標去年增速均居全國第一。如此多的全國第一，覆蓋了重慶的不同產業、不同領域、內外市場等眾多方面，在重慶歷史上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重慶取得的成就是多方位、綜合性的。當年在報道重慶的文章中筆者就提出，重慶模式的特點就是「統籌」、「兼顧」，機遇也從這兒產生。說重慶是一種模式、探索、實踐，講的都是一種路徑、方式，沒有褒貶，只有比較。當時就是

比較了廣東、上海、蘇南、溫州、深圳等改革初期的經濟發展模式，而得出重慶正在啓動一條抵禦金融危機的全新发展之路的看法。三年來的事實證明，重慶確實與眾不同。當年，重慶統籌內外銷市場、統籌經濟發展和解決民生、統籌城鄉、統籌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等等。如今，重慶統籌兼顧的就更多了，「五個重慶」，就是重慶全面發展綜合兼顧的統籌指標。

三年時間，重慶這座山城可以從三線變成一線，從後衛變成前鋒，從跟跑變成領跑，到底是什麼在支撐着重慶政府呢？有人說，重慶能在2011年取得這樣的好成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點就是「民生導向發展」，務實推進「五個重慶」、「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這套「組合拳」的作用。固然，這些都是三年多來重慶的好經驗。三年後，我再看重慶模式，更重要的是，重慶從「以人為本」出發，以「科學發展」為手段，邁向「和諧社會」目標，這是重慶領導們的理念回歸、改革創新、價值提升的強而有力的支撐點。

回歸「為人民服務」理念

經濟高速發展改變了一切，得到的是一部分人走向富裕，丟掉了的很可能是理念和信仰。在這個事事講利益、誠信缺失、道德淪落的社會，不少地方領導甚至和老百姓計較利益。這些敗類已經不清楚執政黨到底代表誰、為了誰的理念。早年共產黨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為了群眾的創黨價值被忘記了，這些人「為人民服務」更難以啓齒，這類共產黨員需要重新作身份認同。重慶恰恰是理念回歸，提出「為人民服務」是黨的生命線，強調在地方當領導幹部經常要想的「共性」問題，就是廣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腦子裡一定要「裝着百姓」。重慶的領導幹部可以「大下訪」、「結窮親」、「三進三同」，是「為人民服務」的理念回歸，是「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繫」的探索。這是重慶經濟亮點的根本。在改革開放中，重慶發展相對滯後，也因此沒

有框框的包袱，反而有了改革創新的機遇。重慶不僅為中國新一輪改革發展探路。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李源潮考察了重慶後還表示，重慶是在解決中國改革的難題。重慶的社會領域的地票制度、醫藥平台、公租房建設；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革、加工貿易模式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都發展理想。「兩翼」農戶萬元增收，讓300萬農戶戶均增收1萬元，重慶都有創新。在養老、醫療、教育、交巡警、校警、留守兒童等各個領域，重慶都有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改革創新措施。這是重慶經濟亮點的動力。

增加就業減基尼系數

重慶從過去的小山城變為今天中國有影響力的直轄市，尤其是通過改革創新，「五個重慶」建設，讓這座城市提升了價值。在重慶排名全國眾多第一名的指標中，重慶市長黃奇帆說了他最滿意的三個指標：第一個指標是在工商部門註冊登記的企業數量。原因是，「廣大就業創業人員一定是在工商企業中產生的，所以這個指標代表就業人數的增加，代表GDP來源能力的增強，也代表了共同富裕。」第二個指標是重慶變成開放口岸的指標。「過去，內陸從來不可能是口岸，口岸的單詞沒有在內陸寫過，西部開發十年也沒有出現過。」黃奇帆說，重慶突破了意識形態上的、傳統理論上的認識，在內陸無中生有造了兩個保稅區，重慶成了開放的前沿，轉口貿易在重慶一直持續下去，規模會越來越大。第三個是基尼系數的減少，從2010年的0.438降低到去年的0.42。黃奇帆說。「為什麼最滿意這三個指標，因為它們分別代表了市場化、代表了開放、代表了共富。」這是重慶經濟亮點的核心價值。

將重慶放到這些年中國整體發展的大環境中，可以看到，重慶的變化和沿海的發展不一樣，讚賞和批評的聲音都很激烈。但數據和重慶老百姓最有發言權。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選民登記莫矯枉過正

□金劍

港事港心

去年11月區選發生多宗懷疑「種票」個案。為此，社會各界均要求特區政府優化選民登記制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發表文件，提出6項建議諮詢公眾意見，包括研究新登記選民或選民在更換地址時必須出示住址證明，及考慮刑事追究在搬家後未向當局更新住址的選民等。譚志源局長表示會「先易後難」處理，新制度最快或可於今年5月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選民登記前實施。

未報新址非「種票」

防止和杜絕「種票」是必須的，它確保民主選舉是在公平、公正、公開及守法的原則下舉行。這裡的「種票」，指的是候選人與支持者（她）的選民勾結，出現「跨區」投票情況；或選民為支持其心儀候選人，虛報住址「空降」該選區投票。「跨區」或「空降」均可能導致登記的地址名不符實，故唯一辦法是選民更新住址必須通知有關當局，並在投票時出示「通知卡」才可投票。故市民應響應此一新舉措。

但是，未及時報告新址並非「種票」，「是否將有關虛假聲明列為舞弊或非法行為」（見諮詢第6項）卻有矯枉過正之嫌，因而受到各政黨議員和公眾質疑，必須慎重考慮。

首先應明確選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及香港居民在境內遷徙自由乃《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和第三十一條的規定。「遷徙自由」與「選舉自由」兩者並不矛盾，也不應對立。市民若由新界西遷往港島東居住，就應在港島東參加選舉，其權利並無被剝奪，同樣可以支持心儀候選人。登記新址「歸區」參選，完全不應有所抵觸，選民應主動配合。但是，搬了新址，再去原區投票，卻不一定是有意「種票」的。

「跨區參選」也應檢討

有幾種情況不可以歸為「虛假聲明」、「列為罪行」：其一、長者到內地定居，但仍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港仍有投票選舉權，應可回香港的原區投票；其二、在港搬了新址，但因太忙，或疏於理會選民權利，忘了通知當局，選民通知書寄回舊址，這選民一下子投了票，應不是「舞弊非法」；其三、子女成家立業，雖有新居，但為照顧年老父母，或年幼子女從小由父母帶大，故常住父母家，這也不能入罪，視為「非法行為」。還有一種情況，業主原址租出兩年就把單位收回，也不是在「種票」之列。故要不要登記新址、是否動輒得咎，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可一概而論。若一一入罪，全港數百萬合資格選民每逢選舉年豈非一刻也不得安寧？故不能矯枉過正。

選候人的情況也要改變：「長毛」梁國雄住九龍灣，怎麼「空降」到西環選區了？湯家驊住港島，怎能「空降」到沙田第一呢？杜絕「種票」，先要檢討「空降」，誰也沒特權才行。

「赴台觀選」吸引港生

□王日

四年一度的台灣「大選」吸引了來自六大洲的媒體前往採訪。筆者也有幸赴台觀選。讓筆者驚訝的是，在島內多個選舉造勢場合和投票站，竟碰見多名香港學生採訪選舉。正是「他鄉遇港人」，分外親切。原來香港有多家高等院校的新聞系學生組成觀選團到台灣實習採訪，浸會大學新聞系就派出了八十多名學生，城市大學的觀選團也多達一百二十人。

台灣「大選」對於有志從事傳媒行業的莘莘學子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採訪實習的機會：一來在語言上無大大問題，溝通方便；二來港台距離較近，僅一個半小時的航程，毋須舟車勞頓；三來兩地消費水準相若，交通、酒店等費用都在學校和學生的承受能力範圍之內。總而言之，赴台的採訪實習成本不高。不過，最吸引本港學生的應該還是有別於香港的台灣選舉制度。香港將於二〇一七年普選特首。而台灣現已一人一票選舉領導人，因此，台灣選舉制度中的具體操作及選舉氣氛都讓本港學生相當好奇。港生在採訪過程中表現專業，絲毫不比現場的媒體前輩遜色。有謂「初生之犢不怕虎」，港生不僅是觀戰，更拿着攝像機、照相機擠進擁擠的人群，冒着滂沱大雨採訪，讓台灣當地記者也豎起大拇指，讚不絕口。

相較於四年前，這次赴台觀察選戰的香港人數量大增，除了學生，還有政治團體、民間組織、旅行社等也組成形形色色的觀選團。這主要是因為近年兩岸關係突飛猛進的同時，港台關係也有突破性的進展。而這次港人踴躍赴台觀戰也不失為兩地交流的一種形式。